

四部刊要

經部・春秋左傳類

春秋左傳注

四部刊要 經部·春秋左傳類

春秋左傳注

第一冊

〔民國〕楊伯峻撰

前言

(一) 春秋名義

春秋本是當時各國史書的通名，所以國語晉語七說：「羊舌肸習於春秋。」楚語上也說：「教之春秋。」墨子明鬼篇也曾記各國鬼怪之事，一則說：「著在周之春秋。」二則說：「著在燕之春秋。」三則說：「著在宋之春秋。」四則說：「著在齊之春秋。」隋書李德林傳載其答魏收書也說：「墨子又云：『吾見百國春秋。』」（今本無此文，孫詒讓閒詁輯入佚文中。）

春秋之名，似乎其來已久。據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說：

春秋家者，其先出於三代。按汲冢璣語，記太丁時事，目爲殷夏春秋。

由此，劉知幾論定：「知春秋始作，與尚書同時。」但這種推理，很難使人信服。汲冢璣語，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。劉知幾看到其中有殷夏春秋之名，而記的是太丁時事，這個不必懷疑。然殷夏春秋之名，是太丁時原有的呢，還是汲冢璣語作者所後加的呢？則難以肯定。據史記殷本紀，殷商有兩個太丁，第一個是商湯的兒子，殷本紀說：

湯崩，太子太丁未立而卒，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，是爲帝外丙。

這個太丁既未曾坐過朝廷，自無時事可記。第二個太丁是紂的祖父。殷本紀說：

武乙震死，子帝太丁立。帝太丁崩，子帝乙立。帝乙崩，子辛立，是爲帝辛，天下謂之紂。

兩個太丁，後一個太丁，龜甲文實作文丁。王國維所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未曾考及這個文丁。據後漢書西羌傳和注及通鑑外紀，都引有大丁，或太丁，可能沿襲史記殷本紀把文丁作太丁之誤，唐劉知幾史通也誤把文丁作太丁，而其人爲紂之祖則甚明。但並無夏殷春秋之名。備考卜辭，確如于省吾歲時起源初考所言，「有春、秋而無冬、夏」。更沒有「春秋」這一雙音名詞，足見所謂夏殷春秋者，是汲冢環語作者所加，並不是如劉知幾所云，「其先出於三代」。

據墨子，各國的史書都叫春秋，所以左傳昭公二年傳說：

晉侯使韓宣子來聘，……觀書於大史氏，見易象與魯春秋。

孟子離婁下也說：

晉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魯之春秋，一也。

那麼，「春秋」既是各國史書的通名，也是魯國史書的專名。因爲各國史書，有的各有專名，晉國的叫乘，楚國的叫檮杌，它們和魯國的春秋，是性質相同的書。

爲什麼叫「春秋」呢？根據春秋經，一般在一年四季（古人叫四時）的第一個月，縱是無事可記，也寫「春正月」或「春王正月」，「夏四月」，「秋七月」，「冬十月」。春夏秋冬四時之名，至遲起於西周。以詩而論，我認爲豳風作於西周，七月有「春日載陽」，小雅出車也作於西周，有「春日遲遲」。

說文攷部說：「夏，中國之人也。」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却說：「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時並本字本義。」林義光文源徵引這一說法，並引右戲隔「夏」作「𡗗」爲證。

秋季本爲穀熟季節，所以說文禾部說：「秋，禾穀熟也。」尚書盤庚上「若農服田力穡，乃亦有秋」，「秋」字正是這意義。左傳僖公十五年：「歲云秋矣，我落其實，而取其材。」這個秋字，正是四時的秋。古鈔（璽印之璽）文常見「千秋」字，「千秋」正如詩王風采芣「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」的「三秋」。古人每年莊稼只收一次，所以「千秋」猶如「千年」，「三秋」猶如「三年」。

冬，說文（冰本字）部云：「四時盡也。」四季最末一季自是冬季。金文有「冬」字，即冬字，却假借爲終，如頌鼎「頌其萬年眉壽，吮臣天子肅冬」，「肅冬」即「靈終」，和詩大雅既醉「高朗令終」的「令終」同。井（邢）人安鐘云「永冬于吉」，即「永終于吉」。詩唐風葛生「夏之日，冬之夜。百歲之後，歸於其居。」「冬之夜，夏之日。百歲之後，歸於其室。」這「夏」和「冬」，才是四季的夏和冬。

古人記事，標明春夏秋冬的，據趙訪春秋屬辭卷一說：

近代或有以書「王」爲夫子（孔丘）特筆者，按殷人鐘鼎曰「唯正月王春吉日」之文，可見時日稱「王」，乃三代恆辭。

趙訪說的重點在「王」字，我引他的文字重點在「春」字。陸燾春秋胡氏傳辨疑也說：

商鐘銘曰「惟正月王春吉日」，又曰「惟王夾鐘春吉月」，是三代之時皆然。

然而他們所舉商鐘，不曾傳到今天。而在傳世彝器中，似乎還不曾發現過四時的記載。據我所知，只

有商鞅量標有「冬」字，這個商鞅量自己說作於秦孝公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，便在春秋之後一百三十多年。古本竹書紀年大半輯自前人所引，引文不但不完全，可能還有修改變動，然而原本既已喪失，現在不能不依靠輯本。而輯本也絕大多數不標春夏秋冬四時。唯初學記二、太平御覽十四、北堂書鈔一五二引西周時一條，說：

夷王七年冬，雨雹，大如礪。

這一條不知道是否紀年作者鈔自西周夷王原始記載，還是他本人改寫。但這條的「冬」字，依情理論，後人難以妄加或妄改。如果這個推斷不錯，那麼，古代史書於每季的第一月或者最初記事之月，標明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從西周已是如此。

古人於四季中，較多的重視春、秋二季，所以經常把「春」「秋」二字連用。如周禮天官宮正說：「春秋以木鐸修火禁。」又地官州長說：「春秋以禮會民。」詩經魯頌閟宮說：「春秋匪解。」（左傳文公二年引有此語）禮記中庸說：「春秋修其祖廟。」其餘如左傳僖公十二年管仲之言，若節春秋來承王命，周語上「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」，楚語上「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」，春秋二字連用的多得很。

這些辭語有些在春秋經文既成以前，而大多寫於春秋經文既成之後，更是寫在韓宣子所見的魯春秋之後，但它反映春秋和春秋時代以前的現象，是不容易置疑的。無怪乎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說：「蓋以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，年有四時，則錯舉以爲所記之名。」意思是史書之名爲「春秋」，即是節取「春夏秋冬」四字中「春秋」二字。

至於公羊傳隱公元年徐彥疏引春秋說說孔丘以其書「春作秋成，故名春秋」；又引三統歷說「春爲陽中，萬物以生，秋爲陰中，萬物以成，故名春秋」，恐怕都不足信。

後來別的書也叫做「春秋」，現存的有晏子春秋、呂氏春秋等，「春秋」意義和史書的「春秋」不同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。

(二) 春秋和孔丘

據史記、漢書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等書，春秋有三種傳授本，也就是三種講解本。三種傳授本，第一種是左氏春秋，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寫的，所以漢書藝文志（以後簡稱漢志）春秋類列它於第一，名之曰「春秋古經十二篇」，其他二種是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，據漢志說，這兩種本子是口耳相傳，到漢代才用當時文字寫出來，漢志稱之曰「經十一卷」，班固又自注說：「公羊、穀梁二家。」詳細情況，可以參看王先謙漢書補注和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（二十五史補編本）。古代經自經，傳自傳，各自單行。傳是對經加以講解的，所以有三種傳授本，也就有三種講解本。漢志列有「左氏傳三十卷」，公羊傳十一卷，穀梁傳十一卷。其餘還有鄒氏傳十一卷，夾氏傳十一卷。鄒氏傳沒有老師傳授，夾氏傳只見於劉向別錄、劉歆七略的著錄，班固不曾見到書。梁阮孝緒七錄說：「建武（後漢光武帝年號，公元二五——五六）中鄒、夾氏皆絕。」那麼，更不必談它了。

因爲公羊和穀梁經，傳是用漢代當時文字隸書寫的，所以稱爲「今文」，並且「立於學官」，即在國立

大學中有「博士」講授。左氏傳是用先秦文字寫的，所以稱爲「古文」，却不得立於學官。左氏傳當西漢時，雖然未能在國立大學開科傳授，却從戰國直到後代，相當盛行。即在西漢，傳授注解的很多，如漢書儒林傳說：「漢興，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、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。」

三種經文，大體相同。自然也有差異很大的。而最重要的差異，一是公羊經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寫道：

十有一月庚子，孔子生。

穀梁經也寫道：

庚子，孔子生。

而左氏經却没有這一條。二是公羊和穀梁經，傳寫到魯哀公十四年「西狩獲麟」，左氏經却繼續寫到魯哀公十六年「夏四月己丑，孔丘卒」。傳不但寫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國，而且還大略敘述了趙襄子和韓、魏二家共同滅亡智伯，這是春秋以後幾年的事了。由於三種春秋傳授本，一種記載「孔丘生」，一種記載「孔丘卒」，左傳還記載了魯哀公弔唁孔丘之辭，又加上孔丘學生子貢的評論。就從這個現象看，不能說春秋和孔丘沒有關係。

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，是左傳作者。僖公二十八年說：

是會也，晉侯召王，以諸侯見，且使王狩。仲尼曰：「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訓，故書曰：『天王狩于

河陽。』」

根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所引竹書紀年，紀年作「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」，既沒有以臣召君的文字，不知魯史原先怎樣敘述的。從史記晉世家「孔子讀史記，當即魯春秋或者晉乘」至文公曰：「諸侯無召王。王狩河陽者，春秋諱之也。」那麼，今本「天王狩于河陽」，司馬遷便以為孔子所讀原文如此。紀年記載和春秋不同，紀年是以晉和魏爲主的史書，自然可能和魯史不一樣。但左傳強調春秋爲孔丘所修，不止一次。又如成公十四年傳說：

君子曰：「春秋之稱，微而顯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盡而不汙，懲惡而勸善，非聖人，誰能脩之？」這君子之口的聖人，即是孔丘，猶如公羊的「君子」。公羊莊公七年傳說：

不脩春秋曰：「雨星不及地尺而復。」君子脩之曰：「星實如雨。」何以書？記異也。

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發生的流星雨現象，並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紀事。那麼「星實（亦作「隕」）如雨」是紀實。流星雨也有不曾達到地面而消滅的現象，那是西漢成帝永始二年，即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，即公羊傳所謂不脩春秋「雨星不及地尺而復」，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。公羊傳作者認為有所謂不脩春秋，大概就是魯國史官所記載的原本春秋。孔丘曾經脩改它，便是今日的春秋。公羊所謂「君子修之」，王充論衡藝增篇和說日篇都說：「君子者，孔子。」真是一語破的。孟子滕文公下更說：

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（同又）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春秋。春秋，天子之事也，是故孔子曰：「知我者其惟春秋乎！罪我者其惟春秋乎！」

左傳和公羊傳只說孔丘脩春秋，孟子竟說孔丘「作春秋，越說越遠。孔丘自己說過「述而不作」（論語述而），孟軻硬說他「作春秋」，豈不和孔聖人自己的話矛盾嗎？

我認爲莊子齊物論是莊周自己的筆墨。他也說：

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；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，聖人議而不辯。

莊周這裏所謂「聖人」指的是孔丘。天下篇也是莊周自己寫的，他又說：「春秋以道名分。」細玩莊周的文字，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識，即有孔丘的筆墨。不過只「議」而不「辯」，目的在「經世先王之志」而「道名分」。

那麼，孔丘在什麼時代脩或者作春秋呢？史記孔子世家列之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，而且說：

子曰：「弗乎弗乎！君子疾殽世而名不稱焉，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？」乃因史記，作春秋。

如果這話可信，孔丘作春秋，動機起於獲麟。而孔丘於二年後即病逝。以古代簡策的繁重，筆寫刀削，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書，過了七十歲的老翁，僅用兩年的時間，（據第一節所引春秋說，僅用半年的时间。）未必能完成這艱巨任務罷。同樣是司馬遷做的史記，十二諸侯年表序却說：

是以孔子明王道，千七十餘君莫能用，故西觀周室，論史記舊聞，興於魯而次春秋。

這一段話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。世家記孔丘到周王朝，在孔丘三十歲以前，其後未載再去周室。孔丘

三十歲以前去周室，在魯昭公之世，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？論語是專記孔丘和他門弟子言行的書，却沒有一個字提到春秋，更不曾說孔丘修或作過春秋。論語中記載孔丘讀易，而且引用過詩和書，並且自己說：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、頌各得其所。」（子罕），那麼，他確實整理過詩經的雅和頌的篇章。他若寫了或作修了春秋，這比整理雅、頌篇章貢獻還大，為什麼他和他學生都一字不提呢？

春秋經文記載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，在魯國經歷十二個君主，尤其是當時形勢經過很大的變化。春秋爲魯國史書，又不曉得經過若干人的手筆。這些史官（當時叫太史）一方面不得不適應當身的形勢，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觀點和文風，這在春秋經文中表現得相當明顯，下文將舉例證明。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，爲什麼不把文風統一，尤其不把體例統一呢？

以形勢論，春秋初期，黃河下流諸國比較富強，而鄭國以爲王卿士之故，稱強稱霸，甚至和周桓王相戰而獲勝。不久，齊桓稱霸，楚也日見強盛，宋襄爭霸未成。秦穆霸西戎而晉文、晉襄久霸中原。這是一變。晉國政出多門，吳國突起，越又滅吳。這是後期形勢。因之，魯史紀事便有不同體例，在注中都曾注出。現在我略舉出幾條：

一、隱、桓二公時，非魯國之卿大夫無論盟會、征伐都不寫卿大夫之名。莊公二十二年春秋「及齊高傒盟于防」，這是和外國卿結盟寫出他姓名的開始。文公八年春秋「公子遂會晉大夫趙盾于衡雍」，這是盟會，魯國和魯以外之國卿都寫上姓名的開始。

二、征伐，非魯大夫書名（寫出姓名）詳隱公二·九注。

三、諸侯書某人，詳隱公十·二注。

四、書「帥師」見文公三·七注。

五、楚國君，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稱「楚人」，文公九年一則書「楚人」（實是楚穆王）伐鄭，一則書「楚子使椒來聘」，書「楚人」「楚子」同在一年。宣公五年以後就都書「楚子」。而且楚大夫書名，也從「使椒來聘」開始，椒是鬬椒，却不寫他的姓氏。

孔穎達疏說：「推尋經文，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，閔公以下皆書氏，亦足以明時史之同異，非仲尼所皆貶也。」（見隱四年經、莊十二年經、文九年經孔疏。文九年疏亦「下衍」不字，應依校勘記刪正。）孔穎達說「時史有同異，非仲尼所皆貶」，這是確有心得的話。

不但孔穎達有這論點，其他人也有相類似或者更進一步的看法。前文曾徵引趙訪的看法，「王」字並不是孔丘的特筆。陸彙也徵引金文，認為：

今世所傳古器物銘，往往有稱「王月」者，如周仲稱父鼎銘則「王五月」，父己鼎銘則「王九月」，敬敦銘則「王十月」，是周之時凡月皆稱「王」，不獨正月也。商鐘銘曰「惟正月王春吉日」，又曰「惟王夾鐘春吉日」，是三代之時皆然，亦不獨周矣。以爲立法創制裁自聖（孔丘）心者，殆未考於此耶？

彝器銘文標年月時有「王」字，在現今傳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證明。而且這「王」字有不同意義，如采伯

敦（王國維觀堂別集補遺羌伯敦跋讀爲羌）云：「唯王九年九月甲寅，王命□公征眉敦」云云，衆伯戎敦云：「唯王正月，辰在庚寅，王若曰：『衆伯戎！繇自厥祖考有勞于周邦』」云云，這種「王」字，是指周王，卽周王所頒曆法之年月，絕不是如公羊傳所云「何言乎王正月，大一統也」。齊侯鐘云：「唯王五月，辰在戊寅，師于溜」云云，齊子仲姜罍、楊樹達先生積微居金文說改稱鞶罍，「唯王五月初吉丁亥」云云，也是表明齊用周曆。至于楚王熊章鐘銘之「唯王五十有六祀」，此「王」乃楚惠王自稱，器亦戰國時器。楚王頤鐘銘云：「唯王正月初吉丁亥，楚王頤自作鈴鐘」云云，楚王頤卽楚成王，文元年春秋「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」可證。則春秋時，楚所鑄器物，銘文之「王」，是楚王自稱，楚自用楚曆，非周王之曆，由此兩器可以斷言。我而且懷疑晉姜鼎銘之「唯王九月乙亥」之「王」，也不是周王。晉姜乃姜姓女嫁于晉國者。銘有「勿廢文侯（顯）命」，文侯就是晉文侯仇，周平王東遷得到他的大力支援，現存尚書文侯之命足以爲證。晉用夏正，不得稱「王九月」，則「王九月」之「王」是指晉侯。王國維觀堂別集補遺有古諸侯稱王說，舉衆伯敦、衆伯戎敦蓋等彝器爲證，而不知楚之稱王，明見左傳，彝器中亦有之。晉器亦有稱王的。足見公羊傳所謂「大一統」之說是騙人的鬼話。

公羊傳昭公十二年云：

十有二年春，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。「伯于陽」者何？公子陽生也。子曰：「我乃知之矣。」在側者曰：「子苟知之，何以不革？」曰：「如爾所不知何？」

何休注云：「子謂孔子。時孔子年二十三，具知其事。」依孔子之意，「伯于陽」應作「公子陽生」。姑不論

這點的是非。據何休注和徐彥疏，孔丘親見其事，魯史有誤而不改。那麼，明知史文有誤而不訂正，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沒有？這不是不打自招？孔丘只是沿舊史文麼？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二春秋不告不書義曾經問：「策書參錯，孔子何以不訂正之？」

穀梁傳於僖公十九年云：

梁亡，鄭棄其師，我無加損焉，正名而已矣。

「我無加損焉」，這也是穀梁傳作者偽託孔丘的話的自供狀，說明孔丘對魯春秋原文並沒有增減。至于「正名而已矣」，不過爲孔子修春秋作一調停之筆罷了。

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說，到西漢所謂經師之手，越說越神奇。舉一個例子爲證。僖公經云：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，隕（公羊作「實」，同）石于宋五。

公羊傳說：

曷爲先言「實」而後言石？實石記聞，聞其碩然；視之，則石；察之，則五。

穀梁傳也說：

先隕而後石，何也？隕而後石也。于宋四竟（境）之內，曰宋。後數，散辭也。耳治（猶言聽而知之）也。

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說：

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。名物如其真，不失秋毫之末。故名「實石」，則後其五。……聖人之

謹于正名如此。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。

「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」，本是孔丘對子路說的話，見論語子路篇。董仲舒就用來贊美春秋，以爲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，一字的先後都有重大意義。殊不知史通惑經篇引竹書紀年也作「隕石于宋五」。竹書紀年難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？無怪乎劉知幾於惑經篇對孔子作春秋，提出很多疑問。劉氏真有高見特識！

我還可以從春秋、左傳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魯史本文的證據，孔丘不曾修改。左傳文十五年說：

宋華耦來盟……公與之宴。辭曰：「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，名在諸侯之策。臣承其祀，其敢辱君？」

宋華督殺宋殤公在魯桓公二年，春秋說：

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。

華督說「名在諸侯之策」，可見各國史官都是這樣寫的。至於宣公二年春秋「晉趙盾弑其君夷皋」，襄公二十五年春秋「齊崔杼弑其君光」，都本於晉、齊兩國太史的直筆，左傳都有詳細的紀述，孔丘何曾改動？另外再提幾個證據。襄公二十年傳說：

衛甯惠子疾，召悼子曰：「吾得罪於君，悔而無及也。名藏在諸侯之策，曰『孫林父、甯殖出其君』。君人則掩之。若能掩之，則吾子也。若不能，猶有鬼神，吾有餒而已，不來食矣。」悼子許諾，惠子遂卒。

由這段文字看，孫林父、甯殖當初逐出衛獻公，諸侯史書都書「衛孫林父、甯殖出其君」，這是甯殖自己也知道。他臨死迫切期望他兒子替他洗刷、掩蓋這一醜名，惟有把衛獻公再送回國一法。他以「不來食」（不享受祭祀）要挾兒子這樣做，甯喜（即悼子）果於魯襄公二十六年殺掉衛殤公，復立衛獻公。現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經把「孫林父、甯殖出其君」改為「衛侯出奔齊」，不罪甯殖，而罪衛獻公，就是甯殖的「掩之」。這一定是甯殖把持衛國政權，改行通告諸侯，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。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，為什麼不保留「衛孫林父、甯殖出其君」的原文原事呢？足見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。禮記坊記曾兩次引魯春秋，一次說：

故魯春秋記晉喪曰「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。」

這是坊記作者引兩年之事並舉，因而文有省略。春秋僖公九年說：

冬，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。

十年又說：

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。

坊記作者所引爲魯春秋，即是魯史記，而基本上和今日春秋相同。一稱「殺其君之子奚齊」，一稱「其君卓」，可見魯史原本來和今日春秋經文同。坊記還引魯春秋「孟子卒」，更和今日哀公十二年春秋經文一樣。由此，更可見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。坊記還曾引論語，足見其作者在論語書名已定之後，他引春秋而稱魯春秋，一種可能是當時他還能看魯史記，更可能是他不認爲孔丘曾修春秋，當時所傳的

春秋就是魯史本文。

竹書紀年「楚囊瓦奔鄭」(春秋集傳纂例一引劉昺書)和定公四年經「楚囊瓦出奔鄭」，只少一「出」字，可說基本相同。

由此看來，孔丘實未嘗修春秋，更不曾作春秋。後代學者也有不少人對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懷疑，但他怕背負得罪聖人之名，不敢直說，只能婉曲說出。縱是說得婉轉，他們的真意還是可以看出。今根據朱彝尊經義考引幾條：

鄭樵曰：「以春秋爲褒貶者，亂春秋者也。」

朱熹曰：「聖人作春秋，不過直書其事，善惡自見。」

劉克莊曰：「春秋，史克之舊文也。」

另外，清人袁穀芳春秋書法論說：

春秋者，魯史也。魯史氏書之，孔子錄而藏之，以傳信於後世者也。

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：

吾則曰，春秋者，魯史之舊文也。春秋總十二公之事，歷二百四十年之久，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。此數十人者，家自爲師，人自爲學，則其書法，豈能盡同？

那麼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麼關係呢？我認爲孔丘曾經用魯春秋作過教本，傳授弟子。論語述而曾經說「子以四教，文、行、忠、信。」在這四者之中，文自包括魯國歷史文獻，即當時的近代史和現代史。